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理想人格的追寻

Lixiang Rengo De Zhuxun

论批评家李长之

梁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理想人格的追寻

——论批评家李长之

梁 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人格的追寻:论批评家李长之/梁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0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ISBN 978-7-301-15821-0

I. 理 II. 梁 III. 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412 号

书 名:理想人格的追寻——论批评家李长之

著作责任者:梁 刚 著

责 任 编 辑:张 晗

封 面 设 计:奇文云海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5821-0/I · 2152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的 62752025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9.25 印张 142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	王一川(1)
引 言	(1)
第一章 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渊源	(7)
一 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发展演进	(7)
二 李长之理想人格概念的中西思想渊源	(15)
第二章 追慕“完人”理想	
——论李长之的德国美学批评	(25)
一 温克耳曼批评	(25)
二 康德批评	(28)
三 洪堡批评	(33)
四 “完人”理想	(34)
第三章 反省“五四”与回眸孔子	
——论李长之的文化批评	(42)
一 李长之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省	(42)
二 评李长之的孔子理想人格论	(46)
第四章 人格与语言的交响	
——论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方法与实践	(64)
一 论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方法	(64)
1. 论李长之文学批评的体验维度与文化维度	(64)
2. 论李长之文学批评的语言维度与核心命题	(73)
二 论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实践	(80)
1. 《鲁迅批判》	(80)
2.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83)

3.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87)
4. 其他:古典文学名著鉴赏与现代文学书评	(97)
第五章 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的追忆	
——论李长之的画论批评	(109)
一 李长之与中国古代画学的体系化理论建设	(109)
二 李长之论中国画与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	(111)
结 语	(122)
参考文献	(137)
后 记	(141)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

本丛书记录下我和一群年轻同仁的一次难忘的中国现代学之旅：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协力对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作了一次新的探究。说到传统，人们总会不假思索地以为那只是指类似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古代时光，而忽略“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现代，仿佛唯有古代才配称为传统。对置身当代的我们来说，苏轼的“气自华”固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回瞥意味，但鲁迅的“求新声”却不能不说正是中国现代历史现场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晚清以来国人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变法自强、实施启蒙乃至燃烧革命烈火的历史，已经和正在成为中国传统，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性传统。在一次新的探究之旅中重新回望作为中国现代性传统之一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恰是我们的初衷所在。

从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是我经多年摸索后找到的一个研究方向。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学问，是中国人对中国现代性文化的研究。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学”不同，也与外国学者从事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不同，中国现代学主要研究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传统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从中国现代学视野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和美学，可以更准确而深入地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文论现代性及审美现代性的面貌及其意义。本丛书旨在对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文论特色展开研究，即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着重发掘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学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里选取中国现代学这一特定视角，正是企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创新。从中国现代学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有可能更充分地认识中国现代传统的文化身份和积极意义。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

处于现实状况的选择与熔铸中。中国传统是基于现实需要并在现实中重新创造的由过去传承的符号表意系统。这种传统既有古典性传统,也有现代性传统,两者共同构成我们当今所身处其中的中国传统结构。应当在继续充分尊重和弘扬中国古典性传统的现代意义的前提下,纠正那种只强调古典性传统而忽视或轻视中国现代性传统的偏颇,跨越传统仅限于摒弃古典性传统的成见,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性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整体的一种新形态,是与古典性传统不同但却同样伟大的新传统,需要积极予以承认并加以认真研究。这种承认和研究,对于正在持续展开的中国现代性进程和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传统建设及中国文化的个性伸张,都应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丛书拟重点考察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及美学家或相关问题,着力探测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论传统的积极价值,以便在当前新世纪语境中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作新的观照。同时,运用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状况,可以揭示以往被忽略的新问题、新现象及其意义,从而为理论探索带来新的拓展空间。

本丛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在已从事的关于中国现代性体验和现代性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开拓。这具体表现为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考察如下相关问题: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颜面、类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特征、类型等;中国现代文化传统新视野中的文论现代性研究,包括文论现代性的发生、演变、特征、类型等;中国现代学新视野中的现代重要作家、文论家、批评家、美学家研究。

纳入本丛书的六种著作各有其研究重心和特色:

胡继华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宗白华美学思想简论》尝试从“文化精神”角度考察宗白华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美学研究,把宗白华的美学沉思与中国文化复兴事业结合起来加以观照,得出这种美学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的建构的新结论。该书进而发掘出这位美学家对于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物”的“节奏”及其文化根源的探究,揭示了宗白华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历史局限性。

周志强的《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

把汪曾祺短篇小说同中国文学文体的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为汪曾祺重新定位。这部书从分析汪曾祺小说语言入手,探讨“文”的文体意识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体现,以此分析短篇小说的文体功能及其不同意义,进而总结中国短篇小说文体的分化与变迁。书中有关“现代韵白”与现代汉语形象建构的分析,尤其体现了著者独到的艺术发现。

梁刚的《理想人格的追寻——论批评家李长之》引人注目地提出李长之是20世纪中国最富于独创性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的新观点,足以令人对这位一度被遗忘和忽略的大批评家刮目相看。该书以理想人格为焦点,去透视李长之在美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和画论批评诸领域的骄人实绩,其分析的重点在文学批评这个李长之最擅长和成就最大的领域,他如何把时代文化精神的重构、作家审美人格的探究以及文学本文语言的诗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对渴望成为文学批评家的年轻朋友,这显然是一部及时的书。

何浩的《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对鲁迅的“中间物”及其革命作了研究,从鲁迅的文学世界来反思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诸问题,可谓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在鲁迅研究上堪称一次大胆的创新。该书的重点不在文学史料的新发现,而在突破现有鲁迅研究范式及权威话语,在思想史层面上重新发掘出被遗忘的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生存意义新维度的独特建构。鉴于鲁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的重要性,这里重新考察鲁迅和他的“中间物”意识,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的内涵,具有一种先锋的开拓性作用。

石天强的《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把路遥置于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这一新坐标上,更清晰地凸显其在中国现代性传统中的独特价值。该书的主要切入点在空间、身份、形象三个不同视阈,具有突出的解析能力与文化意义,由此呈现出作家及其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小说文本中个体命运的悲剧性,有助于反思中华民族现代性进程中农村和农民的焦虑和困境。

我的《中国现代学引论——现代文学的文化维度》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学问题的专论。从标举第三种现代思风入手,提出中国现代学这一独特学科构想,规定了它的反构型学思性质,由此出发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颜面、

景观和品格作了探索,得出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这一新结论。全书主要结合文学个案展开论述,回放出中国现代性的丰富景观,对相关的革命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先锋主义、拿来主义等种种思潮作了评析,还对近期有关文学个案如王朔和铁凝做了阐释。

这套丛书只是中国现代学旅程的一次处子航,因而欠缺经验、行色匆匆在所难免,期待方家指正。

在筹划与写作多年的这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向我的五位合作伙伴表示感谢,他们是胡继华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周志强副教授(南开大学)、梁刚副教授(北京邮电大学)、何浩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石天强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疆锋博士协助我做了相关组织工作,同时向他致谢。

本丛书属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项目批准号为05JZD00028)成果暨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第二期长江学者科研项目成果。在此谨向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北京师范大学校领导和文学院领导一并致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图书事业部张凤珠主任本着对这次学术探究之旅的热忱,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她和相关社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年5月1日序于北京林莘西里

引 言

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至 50 年代中后期(1957 年前),李长之曾是一位声名赫赫的批评家。他才思敏捷,文章遍及全国各类文学及人文科学报刊的显要位置,立言几百万字。^[1]后因错划“右派”,李长之的名字从中国内地学术界、出版界消失,这一状况持续到 80 年代初。^[2]北京三联书店于 1984 年再版了李长之的名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由于此次印数达 41300 册,许多读者得以初识李长之。幸运的是,这本书也确实是李长之最为重要和成熟的文学批评著作。作为批评家的李长之,理应浮出水面了。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许多人醉心体系化“美学”。^[3]一个批评家的东西,尽管非常出色,也难以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90 年代以来,纯粹的美学体系化诉求已成明日黄花,学术史研究异军突起,李长之终于被纳入学者们的探测视野。温儒敏于 1993 年推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在第十一章《其它几位特色批评家》中专节分析评价了“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他对于李长之的现代文学批评史定位及其批评特色的研究颇有见地,认为《鲁迅批判》“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传记批评家的地位,李长之出版了十多本论著,

功力最深的还是那些带批评性质的传论,如《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4]在今天看来,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在中国内地首次明确地揭示了李长之的现代文学批评家地位,为后来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铺垫。

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思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承认李长之确实受到以圣伯夫为代表的西方传记批评的影响的同时^[5],还须深入探究李长之文学批评的真正特色所在。其实,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自序》中就有一段很能给人以启发的话:“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后来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

表示‘人’与‘作品’并重。但以后写风格的分析时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6]可见,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显然超越了通常意义的“传记批评”,而是把人格与风格(语言)视为一个核心问题。第二,既然李长之给我们留下鲁迅、李白、司马迁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格雕像,并且人格也确实构成李长之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李长之所讲的人格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需要在与中国古代伦理人品概念和西方具有神学内涵的人格概念相比较的意义上考察了,尤其需要揭示李长之“人格”概念的审美与文化双重含意。第三,与通常的认识不同,李长之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批评家,他还出版过专门的美学批评论著:《德国的古典精神》(东方书社,1943年)、美学译著《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商务印书馆,1943年)和文化批评论著《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6年)。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单纯囿于文学批评视野,而应在李长之的美学与文化理论这一更宽阔的平台上返观他的文学批评活动,这样才有可能对李长之获得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我们需要从温儒敏奠立的起点继续前进,直到建构起李长之的美学与文化理论平台,并且在此平台上显示出他文学批评的新维度——人格论语言批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九六届研究生贺志刚在王一川教授指导下,率先在国内高校中以李长之研究为硕士论文选题,并成功进行了论文答辩。贺志刚的硕士论文题目为《文化复兴与美学梦寻——李长之文化论美学初探》,他的诗学分析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修辞论阐释思路对笔者颇有启发。

1996年10月,郅元宝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追忆李长之》一文,很有分量。郅元宝将李长之定位于“学者批评家”,强调李“在当时的文学批评领域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与他的哲学功底大有关系”。他颇有眼光地提出李长之批评“旨归是将文学与文化汇通,在文化的整体构架中发掘文学的意蕴。批评的整体意识与批评的文化意识,是二而一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郅元宝同李长之次女李书女士合作,编选了《李长之批评文集》(列入珠海出版社的“世纪的回响”丛书),为开拓李长之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原始资料基础。不少人是在该书中首次领略了一举为李长之带来批评家声誉的《鲁迅批判》、其深入反省新文化运动缺失的名文《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以及颇见功力的文化批评论文《孔子与屈原》等等。人们发现,李长之的批评世

界竟如此琳琅满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批评家李长之乃是一个秉有诗人气质的学者。他在写《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时,一开篇就说:“我有许多时候想到李白。当我一苦闷了,当我一觉得四周围的空气太窒塞了,当我觉得处处不得伸展,焦灼与渺茫,悲愤与惶惑,向我杂然并投地袭击起来了,我就想起李白了。”^{〔7〕}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自序》中又声明:“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8〕}的确,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往往正在于它能回荡着作者真切的生命呼声。

并且,在揭示李长之作为“学者批评家”时,本书也拟在郅元宝提供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推进。例如,谈到李长之的批评理论渊源,还应提及他的一部重要译介性著作《德国的古典精神》。李长之在该书中对温克耳曼、康德、洪堡、荷尔德林等人的评介至今读来仍感到新鲜有力。我们注意到,青年学者单世联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描绘那令人向往的时代》,首次对《德国的古典精神》作了简要介绍。尽管该文表面上似乎是对一段既往学术史的追述,但作者的写作流露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他认为:“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当年长之先生警惕的唯物主义、宿命主义、虚无主义在近20年又再度盛行。唯物主义表现为赤裸裸利益至上和欲望主义,宿命主义退化为精神比矮运动,虚无主义则扩展为放肆嘲讽一切与直接满足无关的价值,它们联手完成了告别理想主义的‘世纪末’主题。”单世联的这些论述有合理性,李长之确曾高度评价理想主义精神取向:“理想主义往往能自圆其说。这世界上的大思想系统, 可说都是理想主义。人和猪狗不同,人总想着明天。人生究竟是材料,人生的价值乃是在这些材料背后的意义。这就是理想主义的根源。”^{〔9〕}但单世联几乎完全没有看到这种理想主义本身就需要加以辨析和反省,理想化的精神价值固然不等同于事实,但它未必能够完全脱离事实而成为一种自足自在的东西。所谓理想主义,有时也会同乌托邦式的虚幻性结下不解之缘。本书认为,尽管李长之有意鼓吹理想主义,但我们不能在研究中对李长之也采取纯然理想化的态度,这将有碍坚持学术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李长之研究述略中,还应提到于天池。近年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典籍与文化》等刊物上先后发表有关李长之的研究论文。其主要研究成果《批评家李长之》,收入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由于系李长之先生的女婿,于天池的最大研究特色是资料翔实丰富。例如,他在论文中披露:“李长之一生颇以批评家自居”^[10],并引李长之解放后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的文章作为佐证:

如果有人称我为批评家,我听了最舒服,比称我什么都好。谁说批评家不好,我也要当这个声名不好的批评家。从前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时候,有人在关口阻拦他,但是,他说让他往西去是可以的,如果让往东折回一步就不行。我也是同样想,谁要想拉我从批评上退下一步,我就决不答应。河山易改,此性难易啊!^[11]

这段话对于我们以批评家定位李长之扮演的学术角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蕴艳的新著《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别开生面,以学术史与心灵史的聚焦透视李长之,颇能给人以启发。

本书拟在温儒敏、贺志刚、郜元宝、单世联、于天池、张蕴艳等人探索的基础上,把李长之研究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具体思路是以李长之对于理想人格的追寻为核心,追踪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思想渊源与纵向发展历程,进而从(德国)美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以及画论批评四个维度横向展开论述。理想人格这个关键词频现于李长之的各类著述,他本人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界定,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梳理其“理想人格”概念的使用是必要的。

首先,李长之讲的人格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人品概念。人品一般说来是在伦理学“善”的意义上使用的,直接与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等崇高品德相连。这集中体现在孔孟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子罕》)、“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的伦理人格理想上。而李长之的人格概念从根基上不是伦理学的,而是美学的。由此,审美人格分析构成李长之全部批评活动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同时,李长之也扬弃了西方人格概念的神学内涵,因为在基督教文化传

统中,“人格”与超越的“位格神”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人格”以“神格”为前提,并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才得以成立。^{〔12〕}而在李长之那里,人格是纯粹此岸现世的,系指人的精神品质、精神属性。

李长之强调:“体力或武器只能保持一个人的身体,单靠它,却不能保持一个伟大的人格或精神。”^{〔13〕}看来,人格即精神,但这里的“精神”又并非抽象化、概念化的东西,因为真正伟大的人格决不仅限于理智的发挥。在李长之看来,“凡所谓智慧仅靠书本或推理是不能得来的,必须有甚深的体验而后可”^{〔14〕},这也就是说,内在的精神或人格乃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和浓烈的情感。同时,李长之还特别关注人格的文化属性。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玉文化,既刚硬而又温润的玉构成中国古代人格理想的象征并具有现代意义,这就使其人格概念的文化意蕴得以凸显。

总的看来,李长之理想人格概念即指完满人性,具体地说就是感性与理性、生命与文化的交融统一。本书拟首先简要回顾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纵向演进历程。

注 释

- 〔1〕 据统计,李长之生平论文 500 余篇,专集 20 余种。
- 〔2〕 海外学者司马长风在 1976 年版《中国新文学史》中率先对李长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予以高度评价,司马长风认为:“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在另一处又说:“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大致说来,有三派思想:1)是左派的普罗文学论,2)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观,3)是独立作家的文学论,主要作家有刘西渭、朱光潜、李长之、朱自清,还有就是梁实秋了。”(《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台北,昭明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48 页、第 327 页。)
- 〔3〕 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热”的重要总结性成果之一。编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建设一个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已经成为美学学科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在美学领域中的一切努力都应指向这个目标。我们把本书定名为《现代美学体系》,正是为了标明我们对美学学科发展的这一基本认识。”(《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页。)
- 〔4〕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0 页。

- 〔5〕 据韦勒克对圣伯夫传记批评的介绍：“他的兴趣明摆着是在生平方面，圣伯夫建立理论时十分注意根据遗传、体质、环境、早年教育或重要经历来系统地进行传记探究。”（〔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也有对于司马迁生平的关注，他在“天才的培养”一节中写到，“在司马迁十岁以前，是在他的故乡韩城，杂在牧童和农民之群里。司马迁的身体相当好，后来能奉使巴蜀昆明，而且虽受了刑罚，还能著书，未始不是幼年的锻炼使然。十岁以前，他父亲早已经送他人过小学，据他自己说‘年十岁，则诵古文。’这所谓诵古文，就是指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单单读书是不会增长见识的，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又曾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壮游，这次旅行无疑是他父亲的鼓励，——至少在赞许着的。很奇怪的是，他父亲的根本立场是道家，可是教育他儿子的时候，却又加入了儒家的熏陶。”（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37页。）此外，李长之还辟专节写到“李陵案的原委”。（同书第112页—123页。）不过，李长之人格论文学批评的真正根基乃是德国古典美学、现代生命哲学及语言哲学，李长之“人格”概念的确切含义不是生平传记或作家心理学的，而具有审美与文化双重含义。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在以人格为核心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语言维度的重要性。因此，与其说是传记批评，还不如说是人格论语言批评。
- 〔6〕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
- 〔7〕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 〔8〕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页。
- 〔9〕 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成都，东方书社1943年版，第2页。
- 〔10〕 于天池：《批评家李长之》，收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陈平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
- 〔11〕 李长之：《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见《北京日报》1957年5月9日。从该文发表的日期看，李长之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是不难想见的。
- 〔12〕 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相关论述。
- 〔13〕 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9页。
- 〔14〕 同上书，第34页。

第一章 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发展 展历程及其思想渊源

一 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发展演进

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原名李长植。李长之的父亲是一名秀才,母亲上过女子师范,这使年幼的李长之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李长之初中时幸遇国文教师张次山,他本人曾深情地回忆到:

(张先生)虽然在读经命下而讲《大学》、《中庸》,却是与一般人不同的,一般人其实并不看重这些东西,只为了应付上面的公事罢了,……张先生却不是的,他是从心里觉得这些东西有价值,虽然用了新的眼光。……我很信仰他,他讲的话我差不多都格外记出。^[1]

张次山究竟用怎样的新眼光打量儒家经典,他又讲了哪些令李长之难忘的话,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启发了李长之对于中国固有学问和传统的兴趣。李长之还表白说:“我起初理想的人物是曾文正公,顾亭林,黄梨州,以后却索性要作孔子。”^[2]当然,李长之没做成孔子,但他日后写《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时十分虔诚地以孔子理想人格作为精神偶像,应当说与他少时这段读书经历不无关系。

李长之天资聪颖,12岁即开始写作生涯。他最初的诗作发表在1922年的《儿童世界》上,编者郑振铎。李长之所作诗如下:“哗啦哗啦的雨声/惊醒了可爱的小雀/欢喜了青蓝的小草花/那时睡梦中的人/还没醒来。”^[3]李长之的这首短诗生动体现出一个孩子对自然、对生命的礼赞之情和一颗

敏感的体验之心。李长之在少年时代就已萌动的诗情从未泯灭。12年后，北平文学批评社出版了他的诗集《夜宴》。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李长之投身文学批评，诗性体验自然会在其批评活动中占据一个基础性的位置。

在李长之那里，情感与识力，感受与洞察并行不悖才是理想的文学批评家。确实，要做大批评家，没有深厚的哲学、美学理论基础谈何容易。1931年，李长之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1933年春转入哲学系，他志趣转变的关键，是经好友季羨林介绍结识了北京大学德文系的杨丙辰先生。李长之亲切地回忆到：

就因为一个夏天，在杨先生那里玩，他指给康德的书看，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意思，是康德论到壮美，康德说所谓伟大感者，是使一切别的对象比起来都感到渺小的感觉。我觉得康德太妙了，由于我的性格，我对什么不能平淡，我马上热烈地爱康德，又从而爱哲学了。事后杨先生还告诉别人说，是他把我引坏了，不好好地干自然科学，而胡闹起来了，当然，这是笑话。我之从事批评，毅然决然，认清着一条大路走，也是他的指示。^{〔4〕}

李长之开辟的人格论批评之路以德国美学为根基，他所谓“总以为德国的东西好”，明显受到杨丙辰的影响。据李长之说：“在学识上，杨先生是有丰富的德国古典文学智识，还有唯心派的哲学。他的知识，真恰如所谓精神科学的这部门的。在起初，我们还以为他介绍人读的书是偶尔的，后来就知道，在他是一贯的，常在心上的，例如狄尔泰，倭铿，这全是深究精神现象的大师。”李长之还自述道：

督促我赶快读书，必须读完十本美学再说话，又必须深深地钻研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而且短期之内，无论据英文，或者德文，先须读完席勒的《论直抒与婉致》的，却只有杨先生。因为杨先生自己既是个榜样，同时又能直接告诉人该怎么作，所以我得他的益处太大了。他教人总是从根本上来，……对于美学吧，就劝人读康德，对于批评呢，就劝人从莱辛，海德尔，歌德，一致读到狄尔泰。^{〔5〕}

李长之感激地把杨丙辰先生形容为“像阳光一样”，他对李长之的影响既在思想学说上，又落实于具体的人格风范。这被李长之概括为：“他的思